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文學的思想武裝

第七輯 之四

新文藝出版社

文 學 的 思 想 武 裝

阿·蘇爾科夫等著 楊驊等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上 海

目次

文學的思想武裝(楊驊譯)	阿·蘇爾科夫著(一)
我們對人民的責任(劉頌燕譯)	考涅楚克著(三)

文學的思想武裝

阿·蘇爾科夫

對我們文學發展的關心，對作家更進一步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關心，迫切地要求嚴正提出關於文學家思想武裝配合巨大任務範圍的問題，這個任務已由共產主義建設現階段的特質所明確指出。

最近出現的一系列有缺點的劇本，已成為社會上討論和譴責的對象，這不能不使人耽心。我所指的劇本是А·瑪連果夫的『皇太子』，П·佐林的『客人』，Н·維爾塔的『彭畢耶夫的死亡』，戈洛席茨基的『活動分子』和較早發表的Ф·潘菲洛夫的『當我們美麗的時候』（在這個劇本裏，反對蘇維埃日常生活中資本主義殘餘鬥爭的巨大而尖銳的問題是被降低、被庸俗化了。）已故尤利亞·耶諾夫斯基所作劇本『檢察長的女兒』部分也可歸入這一類。

有一個時期（不久以前）在舞台上演出許多劇本，在這些劇本中，一味的粉飾和玫瑰色的氣氛代替了現實的真實表現。而現在演出的一系列劇本中，一股焦油和油煙的味道代替了生活的鮮明色調。在我們文學中，特別在戲劇方面，出現了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一下子不知爲

什麼陳列出一系列犯有重大錯誤的作品，這怎麼會發生呢？以前曾有許多描寫偽善的廠長的劇本，而現在又是一連串描寫醉漢——集體農莊主席的劇本，描寫蛻變了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劇本。

值得我們考慮一下：為什麼在佐林的「客人」，在「皇太子」「活動分子」「彭畢耶夫的死亡」「當我們美麗的時候」以及其他許多劇本裏，一些醜陋的、惡劣的事件都是發生在我們社會上担任領導工作的積極分子中間，而作為主要的反面人物出場的是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科學家和蘇維埃知識分子呢。

我們的劇作家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在這些人的一小部分裏。他們並不設法把我國平凡的普通勞動人民作為一種力量帶到舞台上，這種力量能够糾正錯誤，能够將事件的進程和人類命運的進程指引到正當和必要的軌道上。在這些劇本中沒有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即使他們出現了，看起來也像蒼白的影子。難道我們可能有和真的有像這些劇本中所寫的情況嗎？是的，可能有而且已經有了。它們中的若干事件已成為報刊上討論和譴責的對象。

然而當小品文作者揭露的個別事件成為創作數十個劇本的材料時，得到的結果却是對社會生活的片面的、歪曲的概念，和對那些把全副精神貫注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不分皂白的誹謗。我們國家三十六年間是沿着歷史上欣欣向榮的路綫前進，而不是沿着後退的路綫，這

些客觀事實怎麼能和這種表現生活的「方法」結合起來呢？三十六年來在我國，我們不但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通過集體化的方式改造了農業，創立了新的蘇維埃國家機構和強大的戰無不勝的軍隊，培養了從人民中來、跟人民血肉相連的新的知識分子，這些現象怎麼能和這種表現生活的「方法」相一致呢？這些在我國人民歷史上存在的客觀事實，怎麼能跟劇本中具有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的侮辱結合起來，而那些劇本却一個接着一個上演，從而就以某種典型現象自居呢？

在所有這些劇本中，藝術上的貧乏、題材跟情勢的灰色的雷同、不同作者的劇本中所描寫的環境跟「性格」的灰色的雷同，令人感到驚異。劇本「活動分子」在性格的本質上，在原則上原跟「彭畢耶夫的死亡」一樣，祇是描寫得更加庸俗而已。

在所有這些劇本裏，祇有一種同樣的公式化的「衝突」：位居顯要的老大爺跟教養不良的子女，或者類似這樣的一些人。

我以爲，除了一切其他情況之外，大批腐朽的、誣蔑的劇本的出現，可以解釋爲它們的作者政治思想的愚昧無知，完全不認識蘇維埃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對這種生活的完全隔絕。令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作家們不是從現實中描寫自己的情節和人物，而是按照以前戲劇家所寫的東西；他們處在這樣貧乏的想像力的狹仄的圈子裏，以至在這種情況下，第三個劇本跟以前兩個

竟沒有什麼區別。我們的批評家做得很正確，使一批庸俗的、誣蔑的劇本遭到了打擊。

但這絲毫不意味着，對有害劇本的批評和譴責，應該被解釋為對我們文學中諷刺作品發展方向的打擊。難道有根據來重新審定我們文學中諷刺武器這一個問題嗎？

沒有這種根據。

但是對有害劇本的批評，使我們有根據再一次確定：諷刺作家對現實態度的首要準繩，在於對生活真實的忠實程度，在於確定諷刺之火方向的初步思想立場的明確程度。祇有從這個見地出發，才能討論今日蘇維埃社會中諷刺作品應該是怎樣的問題。

有些人會問：在諷刺劇本或者諷刺小說中，是不是必須有正面人物？另一些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應該怎樣相互對比，方才可使作品不脫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範疇？第三種人問道：哪方面的生活可以嘲笑，可以遭受諷刺的掃射，哪方面不能加予嘲笑？

我認為，那些關心這種配方的人們，最好不要寫諷刺作品，因為這些人精神卑鄙，在現實的基礎上站立不穩，而對於為什麼舉起諷刺作品這一具有打擊性的武器，認識也很模糊。

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生活在未來的俄羅斯的幼芽必須竭力衝破尼古拉——阿歷山大的封建農奴制度這一石層的社會中。謝德林的所有諷刺作品以巨大的力量猛擊當時存在的反動國家政體和它的代表人。然而在謝德林的諷刺作品中，蘊蓄着作者強烈的憤怒的熱情，有着在作品

中不用言詞寫出、但是能够爲所有的人感受的新事物的強有力的感情，而且謝德林諷刺作品中的具有摧毀性的力量是跟這樣一種力量相稱的，那就是他確信俄羅斯不會永遠那樣，確信他所寫的諷刺作品，能使俄羅斯所有事物按照另一種方式進行的時期更見接近。

然而M·左琴科爲了什麼要攻擊他在自己創作視野中引用的一切事物呢？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這是局外人在譏諷我們社會中的陰暗面，在嘲笑我們昨天剛剛從醜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中勉強出來，還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安排就緒，還沒有醫好過去資本主義時代留下的一切癰疽。

從這個觀點出發，人們也不滿意伊爾夫和彼得羅夫天才地寫成的兩部長篇小說，因爲在這兩部小說中，騙子手奧斯塔帕·卞健爾長時期像一把溫暖的刀子穿過鬆軟的黃油似的，貫穿着我們的現實生活，也像營養食物中的細菌一樣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繁殖起來，充滿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這裏，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出小說作者（在一定時期中的他們的創作）所特有的、而後來已爲已故彼得羅夫所完全改正的、以中立態度對待蘇維埃人在黨的領導下在兩部小說描寫的年代中所創造的主要事物的立場。不論這兩位作者的願望如何，那個果斷的、有進取心的、在全部蠢物和笨漢中起作用的奧斯塔帕·卞健爾身上的惡癖，反而使得讀者對他頗爲欣賞。

我不想提供怎樣寫諷刺作品的方案，我想號召諷刺作家站在深信我們三十六年來所創造的事業的真實性和正確性的立場上寫作，幫助人民從沒有戒除的缺點和缺陷中解脫出來，因為這些缺點和缺陷是舊時代的殘餘，它們阻滯我們向前行進。

作家對社會生活認識與理解的程度，以及對生活發展方向的理解，可能作為衡量蘇聯諷刺作品火力的方向和力量的唯一尺度。這樣，具有衝擊力量的諷刺打擊的感染力才能以無限的信心，深入貫徹到偉大而進步的事業的正義性中去，而這個事業正是我們人民在實現着的。

諷刺作家如果能够採取和人民一致的步調，那他寫出來的一定不是誹謗性的文章，而是諷刺作品。寫誹謗性文章的祇是那些人，他們竭力要用諷刺的體裁寫作，但精神上却異常貧乏，或者是那些對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抱模糊和歪曲想像的人。

最近在「新世界」雜誌上出現的犯有極大錯誤的一些文學批評論文（B·波米蘭采夫的「論文學的真實」，Ф·阿布拉莫夫的「戰後散文作品中的集體農莊的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樣錯誤的M·李夫雪茲論沙基孃的作品，以及M·謝格洛夫論列昂諾夫的「俄羅斯的森林」的論文）也證明了在我們組織中政治思想工作的不良情況。

我以為，這些論文的共通點，在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在以檢察長的傲慢口吻，對待戰後年代我們文學的經驗。這種口吻在已停刊的「文學批評家」雜誌的編輯人員中原來已存在了的。

它們的第二個共通點，在於用虛無主義的目光來看我們的現實生活。它們的共同目標是要使作家的視野主要集中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而不是表現我們蘇維埃社會生活的進步趨向。

起初，人們以爲接二連三的虛無主義的論文是各種偶然情況的湊合，可能是由於疏忽，也可能是由於編輯部主編或編輯人員的個別的不負責任。但是把這些所謂「誤寫」的論文並列在一起，那我們不能不認定存在着一條深思熟慮後提出的路線。在我們蘇維埃文學史上有着跟這條路線相同的東西。這條路線在三十年代初進行反對「山路」文學派的鬥爭中，已遭到了譴責和反擊。我們有根據來回憶三十年代末「文學批評家」雜誌所執行的世界主義的、虛無主義的路線，當時它是由一羣反愛國主義的批評家所提出的。在波米蘭采夫的論文中，最明顯不過地提出了要想恢復這條路線的企圖。

我們沒有任何歷史上的根據來恢復這條路線，因爲這個鬥爭的政治思想內容是很明顯的。讓我們試來分析一下這條路線的實質。波米蘭采夫在論文「論文學的真誠」裏寫的是什麼？他的思想立場怎樣？波米蘭采夫寫道，「真誠的程度，也就是對事物的直接反映，應該作爲評價的首要標準。」又寫道，「創作需要才幹，也就是說首先需要真誠。」這個口號能不能自以爲是新穎的東西呢？不能。要知道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資產階級文藝學早已鼓吹這個口號，

而在評價藝術和文學的現象時力圖把社會階級的標準引到道德的範疇中去。在蘇維埃的條件下，托洛茨基化的『山路』文學派曾在三十年代初竭力提出這個口號，那時遭到了正義的、透徹的、具有殲滅性的批評。而在一九五三年末又出現了新的預言家——波米蘭采夫，依舊是換腔不換調的老一套。我們有權利而且應該爲了文學的利益，把他從文學導師的高高的座位上拉到犯了過失的平地上，把他揭穿爲『山路』文學派的後裔。

要理解『評價的首要標準』的唯心主義本質，需要最低限度的馬克思主義學識。真誠這一口號，對於那些希冀把文學的生動現象理解爲社會生活的表現、理解爲組成這個社會的人們的意識、心理和性格的反映和表現的人是沒有任何幫助的。要正確地評價藝術家的才能的實質，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僅僅說明他是不是真誠寫作一點是不够的。必須根據作品來確定作者的社會階級立場，他的思想和理想範圍。那就是說，『評價的首要標準』並不是真誠（這裏談的是關於真正的藝術家，而不是隨波逐流的手藝匠，這是不言可喻的。）而是作家的世界觀。『在火綫上』的作者阿·巴比塞和以類似材料寫成『西綫無戰事』一書的作者雷馬克，在對待所蒐集的材料上都是真誠的。然而怎麼能憑藉『真誠』的標準來解釋巴比塞反對戰爭的聲勢汹汹的抗議和雷馬克的和平主義呢？

左琴科在一九四三年當我們祖國正處艱苦時代發表的令人厭惡的中篇小說『日出之前』，

大概也算是真誠的吧。這篇小說充滿了大儒主義的色彩，充滿了存在於人類中的一切下賤行為的色情狂的風味。路易·雪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表了醜惡的、蠕動着道德腐敗的蛆蟲的『夜邊旅行記』一書，照他自己看來也是真誠的。難道這個虛偽的標準能對我們闡明哪怕一點兒的道理：為什麼無賴，法西斯的低能兒和阿諛者路易·雪林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年代，以自己的自私自利者哲學『寧為貪生的懦夫，毋為犧牲的英雄』，來和帕西納里亞的充滿熱情的口號『與其屈辱而生，毋寧慷慨而死』相對抗呢？

如果論文的作者想使讀者認為他所評價的文學是由隨波逐流者組成的話，那也許能够理解把真誠作為『評價的首要標準』的說法，因為在正大光明的人安放良心的地方，隨波逐流者祇有一個黑暗的空洞。

以前『山路』文學派的人一方面提出真誠這一口號，一方面却作着解釋，說他們用這一口號打擊着隨波逐流者和粗製濫造者。但是他們把所有的作家都暗指為隨波逐流和粗製濫造的人，而這些作家是真正力圖在建設社會主義基礎中幫助黨和人民的。無怪乎這些蘇聯年青文化的敵人，要把偉大的蘇維埃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當作第一個隨波逐流者了。

誰在革命的第三十七個年頭給了波米蘭采夫和庇護他的『新世界』雜誌編輯部權利，來拷問關於文學的真誠，而我們的文學正冠着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阿·托爾斯泰、傑米揚·別

德內依、揚卡·庫巴拉、哈姆查、烏比特、蕭洛霍夫、法捷耶夫以及數以百計的爲人民愛戴的作家的名字？波米蘭采夫、阿布拉莫夫、李夫雪茲和多少有一點這種氣味的年青批評家謝格洛夫從什麼地方獲得了窮凶極惡的虛無主義否認一切的陰鬱腔調，來冒充作大胆的、創造性的批評呢？難道爲了揭穿那些無疑地存在文學界中的隨波逐流者和走街者的祕密，並把他們從文學中清除出去，必須在讀者的精神中種下有毒的種籽，讓他們懷疑所有正直和忠實於人民的、用作品創造了年青的、全世界勞動者所熱愛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文學的文學家主要隊伍的誠懇和真誠嗎？

在我們的文學界中，有着隨波逐流和粗製濫造的現象。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已談到這些現象，並提出了警告。必須徹底地、無情地跟這些現象作鬥爭。但在跟它們作鬥爭時，必須記住，它們僅僅是文學生活表面上的一層浮沫，清除它們不需乞靈於「真誠」這一類口號，而是提高出版、上演的文學作品中的思想和藝術質量的要求。

說了一件事，就難以默不作聲而不說另一件事。波米蘭采夫在宣稱「真誠」這一口號作爲評價的首要標準後，就把自然而然伴隨着產生的原則，即「在文學史中藝術家力求吐露真情，而不僅僅是宣傳」應用到單純的唯心主義原則「直接反映」上去。說得支吾其詞，但已足夠明白。論文前後呼應的明顯意思就是：「不要宣傳，而要吐露真情。」

我們試用這個早就不是新的觀點看一看。但我們對馬雅可夫斯基怎樣辦呢？他寫道：

歌

和詩——

這就是炸彈和大旗，

歌手的聲音

召喚起整個階級

誰

今天

不跟我們一道歌唱

他就是

與我們爲敵！

我們怎樣來對待我們的普希金呢，他寫道：

起來，先知，瞧吧，聽吧，

充滿我的意志吧，

走遍陸地和海洋，

用語言去把人們的心靈燒亮。

我們怎樣來對待在莫斯科詩人紀念碑台座上用青銅鑄成的普希金詩句呢？

我所以永遠和人民親近，

是因爲我會用我的詩歌，

喚起人們的善心……

我們怎樣來對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遺訓？怎樣來對待我們偉大的、經常以宣傳者自傲的文學的經驗，怎樣來對待整個世界文學的經驗呢？

從最近幾個月的實際工作中看來，『新世界』雜誌編輯部工作人員對刊載在政論欄內的資料，沒有顯示出馬克思主義評價的最起碼的才能，現在又採用了讀者支持波米蘭采夫論文的來信。他們說青年都盡力袒護波米蘭采夫。但是難道數十封信，其中沒有一封信是工人或集體農莊莊員寫的，難道大學文學系學生幾篇過於激昂的言論就足於表明真正的蘇維埃社會的意見嗎？這些言論與其是說明『新世界』編輯人員的思想立場的優點，毋寧是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學中的缺點。

波米蘭采夫的論文的宣傳者特別引用了青年們的反應，是有着自己的規律性的。從我國

歷史中，大家知道，以往一些政治投機分子（在文學上，『山路』文學派代表了他們的利益）當時同樣企圖利用青年人渴望真理和正義，以及他們在社會上、生活上的毫無經驗，來損害革命的利益。誠然，他們在這方面很少成功，並受到了青年們的致命反擊。本文作者在最近幾個月裏曾聯同其他的文學家，跟莫斯科和基輔的許多大學生，座談在『新世界』雜誌上刊載的論文中提出的論題。我們可以在各處欣喜地看到，青年們是怎樣迅速正確地認識由誇大的言詞所偽裝，跟我們文學本質格格不相入的這些論文的實質。

波米蘭采夫論文中作為實例說明的那一部分，彷彿談的是個別情況，但是它們聯結起來，就產生了一些跟我們現實生活真正本質相對立的結論。波米蘭采夫所舉的許多實例以及他從中得出的幾個結論，所指的是一切我們發展中的困難，祇是由於地方政權或黨的代表不善於或者不希望按照另一方式安排勞動者生活的緣故。舉一個最具特徵的例子『有胆量的女人』吧。她根據集體農莊莊員大會的決定拚命釀酒，以便用它來灌醉從別個集體農莊勾引來的木匠。她有意識地從國家倉庫中盜竊建築材料來掉換黃油。波米蘭采夫認為她的掠奪性的、純粹富農的行爲是可以原宥的，他富有煽惑性地跟他的對話者，區委書記說：『必須爲新移來的居民造一條直路，免得他們繞不必要的彎路。』初看起來，這個判斷似乎是公平合理的。何況，我們還有官僚主義者、麻木冷淡和剛愎自負的人阻撓着我們向前行進。

但是祇說這些話，就意味着脫離了我們發展中的實際根據。我們的困難，實際上不僅是某些地方的或非地方的組織者和行政人員的無能、愚鈍的結果，而且也是在一定的艱難的歷史條件下巨大的成長的困難。

我們從沙皇帝國接收來的是一個全部被世界大戰破壞、蹂躪的俄羅斯。之後在內戰中又受到干涉者和白衛軍的長時期的毀壞。黨和人民以怎樣艱苦的勞動，才把國家從崩潰的情況中扶立起來，他們怎樣的緊張工作和不惜犧牲，才建立了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隨着一九四一年的來臨，我們國家再度經歷了可怕的破壞。

人們在評價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個別事實時，怎麼能不記住，在建築我們社會主義強大的結構過程中，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解決蘇聯人民生活各個領域中的全部問題。從前農民準備建造一所茅舍，要在五年內各方面都實行節約，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我們是在進行新社會的建設。在極短期間內，我們把工業生產能力增加了十二倍，因此人民會不得不多方面節約。在人民的偉大的創造毅力和創造熱情的基礎上，黨和政府已經在歷史上短短的三十六年間創造了奇蹟，怎麼能用旁觀者冷淡的、煽動性的教訓來對待黨、對待政府呢！

當你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時，那充滿在波米蘭采夫論文中的庸俗的、無政府主義野心的惡意宣傳就更明顯了。